



风采展示

固本强基筑堡垒 凝心聚力开新局

记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先进基层党组织获得者会计学院党委

会计学院党委下设11个党支部,其中4个专业教师党支部,1个行政教工党支部,6个学生党支部。现有党员341人,其中教工党员107人,学生党员234人。在校党委的正确领导下,会计学院党委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推进党建创新,形成党建与教学科研有机结合,与师生成长发展有效融合,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整体功能,为学院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坚持思想建党,从百年党史中坚定理想信念

学院党委通过在“阅读中”学、“情景中”学、“行走中”学、“云端中”学等方式,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学院成立“烽火”党史宣讲团,深入群众,挖掘红色资源,共建单位银源社区、小昆山镇、方塔小学、G60科创走廊,各党支部、班级等通过理论专题、艺术形式、线上线下相结合等多种形式开展党史宣讲,目前开展宣讲活动25场次,覆盖2500余人次。与工商管理学院、财税与公共管理学院、外国语学院开展联学联动,共促提升。联合松江区中心医院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健康义诊暖人心”活动;通过“书记有约”“院长有约”“院校联动”等活动用心用情将实事办在师生心坎上。

榜样力量

6月16日校领导向入党五十周年的党员颁授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颁授纪念章时的庄重与佩戴上沉甸甸的纪念章时的激动心情,依然在我脑海中不时地显现。授章以后,许多年轻的教师干部围到我身边,争着要看挂在我胸前的纪念章,有的还拿出手机来拍照,只听得有人在讲“我还要过多少年才能得到这纪念章呀!”我的照片被老师们发到微信群里,又是一片祝贺的声音。

一阵喧嚣热闹后,我的心慢慢地安静下来,五六十年间在党的教育下走过的历程渐次浮上心头。

1965年,我加入了共青团,没过多久就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那时对党

的认识仅仅是从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的奋斗历史和许多革命回忆录、革命题材小说中获得的,年轻的心灵和健硕的体魄,向往着革命先辈为人民利益而奋斗的业绩。1970年7月在党组织的培养下,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对党的认识只是共产党员应当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为人民服务。在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采伐作业中,为解除繁重的体力劳动,我运用仅有的一点知识,通过机械作业方式,提高了作业效率,减轻了体力消耗,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众多知青的健康。在1977年高考中,我如愿以偿进入大学,攻读“政治教育”专业,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系统学习,对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奋斗目标有了比

较全面的理解。在后来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了全面的认识。退休后,还有一段时间从事思想政治教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体验着我们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怎能不叫人心潮澎湃?

虽然我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两个维护”“四个自信”依然牢记在脑海之中,保持健康思想健康身体,多看看中国发展的伟大成果,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

(作者:“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 黄疆新)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当校领导给我戴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时候,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充分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在党50年以上的全体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充分肯定。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部队大熔炉学习和锻炼,不仅增长了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和帮助,再加上自己多年努力工作,终于在1965年6月加入了我们的党。打那時候起,我决心一辈子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然而,实际生活中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考验。首先是生死观的考验。1968

抓住工作重点,练好基层党建“基本功”

加强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学院配齐专兼职组织员队伍,优化调整支部设置,选优配强支部书记,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实现全覆盖。依托分党校平台,加强对入党积极分子、发展对象、预备党员的培养教育;依托博·约双周五论坛的平台,让党员博观约取,针砭时弊,关注社会发展,担当经世之责;依托党史党建学研社平台,做好社会服务,加强理论学习。

积极探索区域党建联建新模式。学院党委联合松江“七色桥”区域化党建联盟开展红色历史打卡活动,重走“长征路”,领悟长征精神。与银源居民区党总支、松江大学城高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共同参观“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学习“好八连”精神。与海尔卡奥斯、松江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开展“红色资源数字化、智慧党建融合发展”项目,自觉融入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工作。与海尔卡奥斯合作,通过VR新技术使党课成为“有风景的思政课堂”,被人民日报等多家媒体报道。

促进党建业务深度融合。学院教师积极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有机融合,协同推进。以专业建设引领课程建设水平提升,积极培育课程育人金课。学院会计学专业按照学校课程思政的要求,于上半年圆满完成自主专业认证。同时,学院教师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创新创业项目申报,指

坚定信念 步履不停

导学生将“四史”、党史学习与创新过程、创业技巧相结合;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引导学生把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学促干,以学笃行,将“四史”、党史学习的先进思想与实践、成长相结合。

高举党旗 青春无悔

幸运的是,在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遇到了一位坚定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指导下,我系统而有重点地阅读并背诵了大量马恩经典文献,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有了深入的思考。也是在这一阶段,我经过慎重思考,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其次是在价值观的考验。1969年4月退

伍后,我希望到工厂做个工人,但是,我恰恰被分配到市人民银行机关工作,原因是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的重要指示,这叫“掺沙子”。我大约拖了半个月时间未去报到。这时,市人民银行组织部派了二位同志到我家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到党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随着党的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我们老同志不能吃老本,要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更加认真地学习,更加自觉地坚持,在党旗的指引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作者:“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 金剑民)

导学生将“四史”、党史学习与创新过程、创业技巧相结合;指导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实习就业,引导学生把学习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学促干,以学笃行,将“四史”、党史学习的先进思想与实践、成长相结合。

强化党内监督,筑牢党风廉政“防火墙”

学院切实落实落细“四责协同”机制,不断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纵深发展。领导班子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从书记一人抓到全体协同促进。班子成员认真落实委员会、党政联席会、“三重一大”决策机制,不断提升领导班子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和规范化水平。利用党员大会、党委会、党支部会、党校培训等多个平台和形式,多途径宣传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教工党员的廉政教育和学生党员的廉政修身教育。

突出工作特色,激发群团组织“活力源”

以“爱国+”为精神导向,以党建为引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持续开展“行走党课”,献礼建党百年;以“财会+”为专业导向,丰富学科竞赛品牌;以“立信+”为价值导向,彰显校园文化品牌;以“空间+”为建设导向,筑牢思政育人多维阵地。通过工会活动,为教工创造和谐环境。同时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引领和指导,提升学院全体教师师德、师风、师能素养。通过广泛联系,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促进党外人士建言献策,构建“大统战”格局,共绘最大同心圆。

(作者:余文)

较全面的理解。在后来的政治理论学习中,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了全面的认识。退休后,还有一段时间从事思想政治教学,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了较为全面的理解和认识,体验着我们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过程,怎能不叫人心潮澎湃?

虽然我离开工作岗位,但是“两个维护”“四个自信”依然牢记在脑海之中,保持健康思想健康身体,多看看中国发展的伟大成果,这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满足。

(作者:“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 黄疆新)

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当校领导给我戴上“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时候,我顿时感到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这枚沉甸甸的纪念章充分表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们在党50年以上的全体老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充分肯定。

回首往事,历历在目。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部队大熔炉学习和锻炼,不仅增长了军事专业知识和技能,而且得到了党组织的培养和帮助,再加上自己多年努力工作,终于在1965年6月加入了我们的党。打那時候起,我决心一辈子跟党走,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

然而,实际生活中会遇到种种意想不到的考验。首先是生死观的考验。1968

幸运的是,在攻读硕士研究生阶段我遇到了一位坚定而博学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他的指导下,我系统而有重点地阅读并背诵了大量马恩经典文献,对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有了深入的思考。也是在这一阶段,我经过慎重思考,向党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其次是在价值观的考验。1969年4月退

伍后,我希望到工厂做个工人,但是,我恰恰被分配到市人民银行机关工作,原因是毛主席发出了“工农兵要占领上层建筑”的重要指示,这叫“掺沙子”。我大约拖了半个月时间未去报到。这时,市人民银行组织部派了二位同志到我家来,做我的思想工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我认识到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时刻听从党的召唤,到党组织最需要的地方去工作。

(作者:“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 金剑民)

著名经济学家顾准,曾是立信会计老上海时期的实习生,也是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的编写者,更率先将“市场经济”概念引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作为财会专家,顾准在抗战时期就投身革命,虽然一生命运坎坷,但始终葆有一颗赤子之心。如今,顾准的思想和著述再次被人们所发现和重视。

“少年天才”著述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

1915年,顾准出生于上海的一个小商人家庭,父亲姓陈,祖籍苏州,是做棉花生意的,他在家中排行第五,随母姓顾。顾准10岁就进入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教育社读书,读了2年会计学后,因父亲的棉花铺经营不善,家里没钱继续供他读书而被辍学。

之后,12岁的顾准采取半工半读的办法,到潘序伦创办的上海立信会计事务所当了一名实习生。那时,顾准晚上刻苦学习会计学,白天学以致用,短短几年间就成为掌握现代会计知识的专业人士,并逐渐在上海工商界崭露头角,被誉为“少年天才”。

到了20世纪30年代,国内有一批会计学著作相继问世。顾准的《银行会计》可算是其中翘楚。《银行会计》作为当时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被各所大学采用,而顾准也开始了在大学任兼职教授的生涯。

顾准并不只是一个书生。1930年,年仅15岁的顾准就秘密组织了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进社。1935年,顾准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宋庆龄担任主席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简称“武卫会”),并担任该会上海分会主席、总会宣传部副部长。同年2月,顾准加入中国共产党;10月,武卫会组织遭到破坏,他只得到了北平。

在抗日根据地推行经济改良措施

1936年顾准回到上海,先后担任中共上海职员支部负责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文化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上海职业界救国会核心小组成员,负责组织指挥游行活动。

1940年,顾准放弃在上海的事业,秘密到达苏南抗日根据地,任中共江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苏南抗日根据地东路特委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后调任新四军财政经济部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1942年3月,顾准任淮海地区财经处第一副处长,10月到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学习,直到1945年8月再从延安返回南方,任淮阴中共中央华中局财经委员会委员。

当时,骆耕漠兼任盐阜区财经处处长。盐阜地处华中,云集大量军政机关,堪称苏北的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庞大的军费与行政费用,是压在骆耕漠肩上的重担。因为他之前也在上海工作过,听说过顾准的大名,所以一听到顾准要来,就马上找到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提出要调顾准参加盐阜区的财经工作。那天,骆耕漠骑马飞奔到军部招待所,与顾准会面,他握着顾准的手,激动地说:“非常欢迎你来到根据地,当年在上海我即仰慕大名,可谓神交已久啊!”顾准则谦虚地说:“耕漠兄过奖了,你在经济学界大名鼎鼎,我早有所闻,只恨无缘相识。没想到能在敌后相遇,真是欣慰。”两人从上海一直聊到苏北,当天顾准就欣然接受骆耕漠提出的请他担任盐阜区财经处副处长一职的邀约。

盐阜盛产棉和盐,当地有一首民谣这样唱:“雪白的棉花,嫩绿的菜,挑起盐担做买卖……”棉和盐还是战备紧缺物资,需求量相当大。骆耕漠与顾准看准这一点,在苏北区党委及盐阜行政公署的领导下,利用地域优势,刺激盐阜区内外商品流通,推动开展边贸,并统一税收,厉行节约,不仅缓解了供给矛盾,还使盐阜区的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军民生活大为改善。

在苏南、苏北工作的这几年,农村物质条件很差,每月生活费也很低,但顾准毫不在意,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工作中。在苏南抗日根据地东路特委所在地常熟,顾准是特委《江南》杂志和《大众报》的负责人。除了宣传工作,在苏北时,他还是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骆耕漠的得力助手。

重回上海,收拾国民政府财政“烂摊子”

1941年底的一天,正在苏北根据地工作的顾准突然被告知有家属前来探望。原来是一直分居两地的妻子汪璧来看他了。顾准与汪璧早年相识于进社,两人于1934年结婚,感情很好。1940年顾准离开上海参加新四军时,汪璧因身体关系没能同行。眼看上海的形势愈发险恶,地下党组织便安排汪璧和顾准的妹妹陈枫等人,秘密潜往苏北,与顾准汇合。见到妻子后,顾准惊喜万分,夫妻俩终于可以团聚了。可是,却没瞧见幼子,他刚要开口询问,只见妻子眼眶发红,低声说:“儿子已在上海因病夭折了。”当时,他们的儿子还不满2岁啊!顾准紧紧握住妻子的手,希望以此给她一点慰藉,自己却忍不住泣不成声。从此,他化悲痛为力量,全身心扑在了工作上。

1946年1月顾准被调回华东局,为新政权的建立做好财经上的准备。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淮阴利丰棉业公司总经理、苏中行政公署管处处长、山东省工商总局副局长、山东省财政厅厅长等职务。1949年5月上海解放,顾准随部队重返上海,并接管了“大上海”的财经工作,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局长。在此后的3年时间里,他为上海的财税工作做出突出贡献,将国民党政府留下的“烂摊子”,逐渐变成支撑新中国经济起步的最大财源,为日后华东地区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将“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建设

1953年后,顾准先后调任中央建筑工程部财务司司长、洛阳工程局副局长。1956年,他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专职从事经济理论研究。

新中国成立初期,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于1956年底完成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此时,顾准正专注研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并总结出“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他在著作《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中写道,“应以市场价格的自由涨落来调节生产”。这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观点。可以说,顾准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运行市场经济”理论的学者。

顾准的观点启发了老同事孙冶方。作为同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继而深入研究了价值规律问题。顾准的著作还影响了吴敬琏等一批经济学家,为30年后建立市场经济实施改革开放提供了论证依据。

但是,通往真理的道路往往是崎岖的。1957年,顾准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河南商城县。在恶劣的条件下,他结合中国国情研究中国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哲学,仍在不断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晚年的顾准更像是一名哲学家,又或是一名思想上的革命者。1974年12月3日,顾准病逝,享年59岁。(作者:玛蒂娜 原载于《上海滩》2021年第一期)



上世纪50年代,潘序伦与时任上海市财政局局长顾准合影。

顾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先行者

立信校史中的红色记忆